

梁启超对日本的 认识与态度

◆ 袁咏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启超对日本的 认识与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袁咏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04-9884-1

I. ①梁… II. ①袁…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 人物研究
②日本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B259.1②K313.4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2351 号

责任编辑 黄燕生 孙晓晗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罗福惠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明星，无论是对其一生的政治、社会活动，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建树，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留给今天青年研究者深入挖掘或研究发挥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但是袁咏红的《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一书，读来不仅鲜有与前人雷同之嫌，且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归纳本书可取之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厘校视点、确定架构和选用史料上，作者别具匠心地把两条同时发展变化的内容线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论文涉及的时间范围内，梁启超一方面始终在思索中国的改造和前途问题，并且深深地介入了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而构成了梁启超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互动的历史叙述，显示了此过程背后梁启超保皇——倾向革命——君主立宪——赞成共和的思想变化，以及反袁（世凯）——拥袁——再反袁的活动轨迹；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在戊戌至辛亥年间寄居日本，日本的富强，朝野对待中国的所作所为及梁启超的所遇所感，又构成了梁启超本人与日本的互动，此中梁启超与日本有关人物的关系，日本政府对待康、梁的态度，以及梁启超从师日、亲日、联日到反日的思想变化，又构成了该书的另一条内容主

线。而这两条主线又通过与孙中山的关系、组织政闻社、二辰丸事件、访问台湾、如何对待“二十一条”等节点，把梁启超与清末民初政局、梁启超与日本这两条运思进路紧密相连。这种安排避免了传统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割裂之弊，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和思想的关联性。

其次是在发掘资料上能下苦功。史学研究要靠资料说话，而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除了充分发掘利用本土资源以外，对于来自国外的资料应有足够的重视。本书作者投入数年时间，广泛阅读前人有关著述，尤其特地搜寻、利用了日本方面的《日本外交文书》、《伊藤博文关系书》、《近卫笃磨日记》、《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以及当时还未刊出的《日本外务省藏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有关中国清末革命党及流亡者部分》（作者书中注释为《日本档案》加上原档藏页码编号），这是稀见甚至前之研究者未曾用过的史料，因此不仅丰富了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人物行止的细节，还提出并探讨了若干新的历史之谜。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可能是梁启超访问台湾一事，该书通过发掘梁氏本人从未言及，前之研究者也未发现的梁氏在台湾的谈话，结合已公之于世的梁氏《游台湾书牍》和台湾方面的文献，构成了梁氏访台的全景及其言论、思想上的矛盾发展过程。无论对于史实的发掘还是对梁氏思想性格的展现，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还有梁氏在因二辰丸事件所引起的广东抵制日货运动中的态度，也是前之研究者没有涉及的问题，作者通过日文档案中透露的种种讯息，初步揭示了梁启超与这次抵制日货运动的关系。而本书作者认为，梁启超后来坚决反对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并非对日本态度的突然转变，访问台湾及二辰丸事件所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实已构成梁氏对日态度转折的起点。不过因为当时梁氏还处于日本的严密监护之下，今人只要设身处

地，就不难理解他这种“居其国不非议其大夫”式的缄默了。

再次是对梁启超与孙中山、康有为的种种关联，或者三人对同一事件的态度差别，本书多有深入剖析。在庚子勤王事件前后，梁启超全心全意与孙中山合作，此后甚至一度在思想上近孙而远康。但终因康有为的强势和保皇会的组织压力，使梁不归孙而归康，于是孙中山称梁“甚狡诈”。本书再现了梁氏如何在孙、康两派“夹缝”中的挣扎苦斗，无疑可以加深后人对梁启超所处境遇的理解。而在二辰丸事件所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反对“二十一条”的事件中，本书史料所显示出的事实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态度比梁启超更“软”。后人当然可以理解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以打倒主要的敌人清政府和袁世凯；但在当时革命党人的态度却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损害了革命派在手段和道德上的正当性，这不能不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本书可供读者深入体悟的地方。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在研究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时，除了深入了解人物所处的环境之外，还特别注重探讨人物的性格，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谈到人的性格，在文学和心理学中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但一到史学研究中，就只剩下民族的性格、阶级的性格，至多谈到群体的性格。由于简单地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习惯于将某一具体的人物认定为某一民族、阶级、群体的代表甚至典型，于是造成了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多人一面。其实，个人之作用于历史，不仅是因其行为、思想，也还有性格的因素。西谚云“性格即命运”，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个人的性格，并不仅仅是关乎他自己的命运，也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历史的偶然性。于是我们才会看到，有些人物的阶级基础一样，思想主张相同，又同处一样的社会环境，但因性格不同而走上不同道路，或

者行事方式不同。当然性格有多方面的体现，如梁氏在反对“二十一条”时自认是“中国最温和（或者说是最懦弱）的那一派的人”；今之研究者有称梁氏“流质多变”等，都是既基于思想，也关乎性格。20世纪初年梁启超陷于孙、康关系的“夹缝”之中，其游移性格使得他左右为难并最终作了错误选择。在他个人与日本的关系上，从二辰丸事件起双方已萌生芥蒂，但直到“二十一条”时梁启超才公然站出来批评日本，对此我们恐怕很难认为此前梁启超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就全无认识，而不妨归因于他自承的性格“温和”、“懦弱”之故。

本书虽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但在为数众多的梁启超研究者看来，恐怕仍然难免瑕瑜互见。我相信作者会客观地对待可能出现的赞誉或批评，更希望她永远不要停下艰苦探求的脚步。

是为序。

2009年10月末

内容提要

梁启超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梁启超的生平经历又与日本紧密相连。五十六个春秋太匆匆，十四个寒暑何漫漫！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四年后，于不惑之年才回到他深深眷恋着的祖国。

无论是戊戌政变前，还是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都在苦苦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但目前对于任公流亡日本期间的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与缺憾，主要原因则是此“非常时期”的资料收集与利用难度颇大。笔者有幸看到了《日文档案》，为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又狭间直树教授的《梁启超：日本关系年表（1898—1903）》和岛田虔次翻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注释”提供了若干研究资料和线索。因此，本书在这些资料及其他有关重要日文资料的基础上，以梁氏十余年的行止为主轴，并贯穿梁氏对日本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再现梁氏在此期间奔走呼号与上下求索的历史本相与历史情景。

为了尽量避免重复性研究，笔者在相关资料的取舍上颇费思量，力求突出重点，以补充以往研究的缺憾之处。

赴日前，梁启超对日本已有初步的认识，称其“驾欧凌美气葱茏”。其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师法日本”的主张又是如何提出的？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出逃牵动两国，其过程更

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踏上日本国土后，梁启超频频与高层人物联系，希望日本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救助光绪皇帝，笔者根据重要史料《日文档案》、《日本外交文书》、《伊藤博文关系书》、《近卫笃磨日记》及其他日文资料，对于梁启超与日本政界的关系作了剖析。梁启超获准居留日本，他在夹缝中开始了新一轮新的奋争。虽在异国他乡，梁启超也心系维新大业。他还指导、参与了“二辰丸事件”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此事件的发生也使梁启超认识到日本的蛮横无理与侵略本质，是梁氏对日态度变化的契机之一。

1911年春，梁启超访台是其对日认识变化的又一契机。

笔者根据《日文档案》材料和其他重要资料，论述了梁启超访台这一历史事件，并分析了梁氏访台前后的思想变化，梁启超此行加深了两岸同胞的手足之情，也加深了梁氏本人对日本，对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的认识和了解。梁启超在对日态度上，除了战略、策略、外交等因素的考虑之外，更多了一层认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意识形态，以及“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而产生的“视日本如第二祖国”的感情。他此时已经认识到日本已走上帝国主义的不归路，必然侵略中国以求一逞。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爱国不落人后的梁启超毅然挺身而出，抨击、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谬论与侵略野心，标志着梁氏已与“第二祖国”——日本最终决裂。

笔者还论述了梁氏对日本政体、日本文化的认识及对日外交思想。

目 录

序言	罗福惠 (1)
内容提要	(1)
绪论	(1)
第一章 隔海观花	(7)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日本崛起	(7)
一 维新后的制度改革	(7)
二 跻身强国之列	(10)
第二节 对日本的初步认识	(13)
一 认识途径之一	(13)
二 认识途径之二	(21)
三 认识途径之三	(24)
四 师法日本的必要	(31)
第二章 梁启超与日本政界的关系	(40)
第一节 逋逃日本	(40)
一 日本伸出援手	(40)

二	梁启超抵达日本	(51)
第二节	梁启超向日本政界求助	(55)
一	日本国内政局变化	(55)
二	与高层人物的联络	(58)
三	与其他重要人物的往来	(67)
第三节	日本政界人士对待康、梁的态度	(72)
一	不为“秦庭之哭”所动	(72)
二	礼送康有为而容留梁启超	(77)
第三章	夹缝中的苦斗	(83)
第一节	康有为、梁启超与革命派	(83)
一	保皇会的复政努力与勤王谋略	(83)
二	康、梁对待革命派态度的歧异	(88)
第二节	东瀛设帐	(107)
一	梁启超与横滨大同学校	(107)
二	创办神戸同文学校	(118)
三	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122)
第三节	梁启超与留学生	(128)
一	对留学生的鼓励与支持	(128)
二	梁启超对留学生的影响	(134)
第四节	政闻社及二辰丸事件	(146)
一	梁启超指导政闻社	(146)
二	因二辰丸事件引起日方猜疑	(151)
第四章	梁启超访问台湾	(157)
第一节	访台动机	(157)
第二节	言行与态度	(163)

第五章 梁启超与“二十一条”	(175)
第一节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175)
一 城下之盟的出台背景	(175)
二 “二十一条”之交涉梗概	(178)
第二节 梁启超的艰难抉择	(183)
一 再次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183)
二 如椽巨笔劲扫侵华谬论	(187)
第六章 梁启超的日本观	(195)
第一节 梁启超对日本政体的认识	(195)
一 宪政之路的求索	(195)
二 对日本宪政模式的借鉴	(200)
第二节 梁启超对日本文化的认识	(206)
一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206)
二 梁启超对日本主要启蒙思想家的认识	(217)
三 对日本流行的西方思想的传输	(223)
第三节 梁启超对日外交思想	(233)
一 以联日为主的戊戌—辛亥时期	(234)
二 以“防日”为主的一战时期	(242)
结语	(249)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73)

绪 论

时代造就了康、梁，他们的存在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毫无疑问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体现出来的。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并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也包括有像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的‘偶然’情况”^①。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行为构成的。”^②因此，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不仅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一代文化宗师。维新运动中，“公车上书”虽由他的老师康有为策划，而梁启超则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他的《变法通义》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宣言书。梁启超早期的革命宣传和后来的立宪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严复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称梁启超实为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胡适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②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9页。

评论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主义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人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①胡适之语虽有过誉之处，但梁启超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大有干系则是无可怀疑的。张朋园认为在推翻清朝的力量中，“固然应该让革命党坐首座，而任公又何尝不可侧身一席”。^②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总量约一千一百万字的著述。青年中“无论赞成或反对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③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曹聚仁写道：“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④梁启超被认为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治、史学、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法律、伦理、宗教诸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古代学术的研究者们也高度肯定并借鉴他的研究成果。

曾几何时，梁启超的名字是一个贬义词，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岁月已经过去。后来人们越来越发现，此类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违背中立与公正的学术规则，而且过于轻率肤浅。如果把他认作哪个阶级或某个阶级中某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来描述，也不大妥当，因为阶级利益往往只对一般民众

① 胡适：《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22页。

②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331页。

③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④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0—351页。

具有更多的约束力，人类历史上许多才气纵横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的思想有时却往往超出了阶级的限制。他们虽无法超越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却可以超越家庭与阶级的狭隘利益，苦苦思索人民、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整体的未来，在历史上留下闪光的智慧思想。因此，倘若借用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来概括百科全书式的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一生，显然是不合适的。毋庸讳言，史学研究者曾过于满足于某些简单信条，而没有对复杂的历史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将阶级普泛化和绝对化，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以爱国—卖国、进步—落后、激进—保守的两分法来划定历史事件和人物，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政治化，且毫无协商的余地。其结果损害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学界已越来越鄙弃这种简单的学术思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梁启超的历史功绩和影响经过历史的积淀后，显示出其无法遮掩的光芒。

笔者此书无意对梁启超的历史功绩进行面面俱到的叙述与评价，兹选取其在流亡日本后的一段时期为主要考察时段。戊戌变法以前，梁启超对日本有了初步的了解。1898年9月20日梁启超致日本人品川弥二郎的信中写道：万木草堂就学于康有为时期，他曾读过江户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尊王攘夷志士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①此外他写过一篇《读〈日本书目志〉书后》^②，还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作过《后序》。^③这些表明梁启超间接地对日本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② 《时务报》第45册，1987年11月。

③ 作于1896年12月，载1897年3月《时务报》第21册，后收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版《日本国志》。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以日本为活动的基地。孙中山从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到 1925 年在北京逝世，在日本生活约十年；梁启超 56 年（1873—1929）的生命历程中，有 14 年是在日本度过的，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李吉奎先生已写作《孙中山与日本》，激发笔者产生了联想与疑问：梁启超与日本又该如何？20 世纪 90 年代陆续出版了一批维新人士和官绅的书信、文集、日记；海外公私藏档及海外人士的日记与文书也时有披露，^① 这些使得维新人士及立宪思潮与立宪运动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尚有不足，梁启超与日本这个命题也尚有缺憾。

之后，笔者接触到日本外务省藏“日本外交文书”第一门政治中“诸外国内政”第四项“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的“支那之部”。（注：以下简称为《日文档案》）在此未刊《日文档案》中，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有关孙中山“南清独立计划”的记录，这些记录有助于了解事件的详细过程。另外还有很多档案是关于梁启超的，有密札、演讲、行止、谈话等。他的一些密札、演讲、谈话被日方侦悉并抄录了下来，而这些信函未被收录在年谱、文集、全集中，也没有被研究者们所利用。阅读档案时，笔者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此项“工程”的艰巨性，发现新材料固然是一件好事，而如何将新材料放置于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既不一叶障目又不牵强附会、凿空蹈隙，乃至为关键。“革命”话语的导引；当事人的政治需要；^② 史料的不足，造成了历史真实的扭曲及史

① 如《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 1993 年版；《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宋恕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汤志钧、王懋鼎等相继披露了新加坡邱菽园家藏资料。

② 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掩饰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政治需要。

学研究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日文档案》中的记载，颇有助于了解某些事实真相和事件的经过。另外，五卷本的日文年谱中的一些注释又澄清、强调了一些容易混淆和易被忽视的问题，并为深入研究某些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使笔者增强了写作“梁启超与日本”的信心。

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期，也是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物无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社会的烙印。罗志田先生在治史方法上提出“见之于行事”、“前后左右治史”，^①颇能给人启发，这也是本书努力的方向，希望在“行事”中能够较准确地把握人物，能够体现当时的社会镜像之一斑。本书的选题如果说是从一个问号开始，那么这个问号正好画在了“未开发区”。贯穿本书的线索一为时间和事件线索，一为梁启超对日认识逐步深化的线索。前者为行事，后者为思想。梁启超在日本的行止与对日本的认识是完全统一的，他的言行正是他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的反映。从研究视角方面而言，本书较注重经济与政策视角。例如，日本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密切相关；梁启超对日态度与认识的变化必然溯源至日本的外交政策。

在运用史料解决具体问题时，相应地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历代卓有成就的史家，无不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具体采用何种方法，乃是针对具体的研究领域与问题。梁启超从“亲日”、“师日”、“联日”、“反日”这一态度变化的过程无疑是有其内在的演变因缘的，而探索这一变化路径的方法，即为“内在理路”的方法。此外，笔者将根据章节内容的需要借鉴社会学、政治

^①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